

釜山韓國華人華文文學的實踐與意義*

一 以身份認同為中心

梁楠¹ · 李保高² · 金惠俊^{3**}

<目 录>

1. 緒論：釜山韓國華人的獨特性
2. 釜山韓國華人的歷史與華文創作
3. 釜山韓國華人的華文文學：“異邦人”之歌
4. 釜山韓國華人華文文學中的“中國城”：“場所性”的缺失
5. 從“韓戰”到“後遷釜山韓華”：多重身份認同的確定
6. 結論：釜山韓國華人華文文學的意義

1. 緒論：釜山韓國華人的獨特性

“釜山韓國華人”(釜山韓華)，指長期生活在韓國釜山地區的漢族以及被漢族同化或在文化上具有一體性的群體。而釜山韓國華人使用華文創作的文學就是“釜山韓國華人華文文學”(釜山韓華華文文學)。

隨着韓國社會的變遷，韓國華人居住條件的變化以及不同世代生活經驗

* 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PNU-RENOvation(2019-2020).

** 1. 東亞大學中國日本學部助教授, liang-nan@hanmail.net
2. 釜慶大學全球自律專攻學部助教授, bogopanda@pknu.ac.kr
3. 釜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dodami@pusan.ac.kr

的不同，都對韓國華人的文學創作活動產生着極大的影響。從釜山韓華移居歷史情況來看，由於移居時期的不同，釜山韓華群體自身又出現了幾個不同性質的子群體。首先，由於19世紀末期移居釜山的華人，得到了清國政府的大力支持，與20世紀初期以後移居釜山的華人在性質上產生不同，因此將19世紀末期移居釜山的華人稱為早期釜山韓華。其次，鑒於20世紀初期至1992年(韓中恢復邦交)以前移居釜山的華人，與1992年以後移居釜山的華人在性質上的不同，以1992年為分界，劃分為先遷釜山韓華和後遷釜山韓華。最後，由於開始於1950年代，並在1970-80年代形成規模的再遷現象，將先遷釜山韓華中再遷往其他國家的群體，稱為再遷釜山韓華。

有關釜山韓華的歷史，金泰萬(2009)、曹世炫(2013)等學者已經做出了較為詳細的調查與研究。但有關釜山韓華華文文學，只有金惠俊(2012)、梁楠(2018)等學者在針對韓國華人華文文學進行整體性研究時，也分析過釜山的韓華作者及其作品。除此以外，至今尚未發現系統探討釜山韓華華文文學的研究。而就釜山韓華的歷史與釜山韓華華文文學創作的關係問題，同樣是有待填補的研究空白。

釜山韓華的歷史，具有不同於韓國其他地區韓國華人的獨特性。這些獨特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釜山韓華具有相當的“移動性”。早期釜山韓華以商人為主，但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隨着連接釜山、上海、海參崴航線的重新開通，大大增加了華人的釜山流入，使原本以華商為主的釜山韓華人口結構，逐漸變為以勞動者群體為主。此時期移居而來的韓華勞動者大都懷有經濟充裕後便錦衣還鄉的打算。而20世紀上半葉移居釜山的韓華，又大多由於戰亂的原因，戰後生活趨於穩定，隨時有可能重返故鄉。第二，由於釜山屬於港口城市，與境外進行貿易交流的機會，要多於內陸地區。而釜山韓華比較集中的草梁地區，在地理環境上更具有“多元性”特征。20世紀50年代，這裏曾被稱為“德克薩斯街”，是參加過韓國戰爭的美軍經常光顧的娛樂街。20世紀90年代，韓國與俄羅斯建交後，俄羅斯船舶進入釜山港，俄羅斯船員和小商販大舉進入釜山港。從此，德克薩斯街開始掛上俄語招牌，面向俄羅斯人的店鋪開始營業，逐漸形成了俄羅斯人的外國人購物街。

釜山韓華主要移居地區環境上的“多元性”，很可能成爲他們同化爲當地人的一種障礙因素。因爲與外國人接觸頻繁，對其自身的“外國人”身份認同上形成影響，即使在釜山地區出生的韓華，也會因爲從小與外國人接觸，而自然接受自己的“外國人”身份。另外，由於釜山的中國城所在地較多外國人聚居，很容易使韓國人覺得這個地區就是一個具有“異國情調”的外國人聚居區。最終給釜山韓華在身份認同上造成影響。因此釜山韓華創作的文學作品，在與韓國其他地區韓華的文學創作，具有共同特征的同時，也不能不排除具有其自身獨特特征的可能性。

釜山韓華所具有的“移動性”，又可能造成生活上的不安定，從而對其文學或文化活動的發展造成限制。事實上，從整個韓國華人華文文學創作情況上來看，也確實最先在首爾地區興起，至少在1960年代就已經在首爾發行了韓華華文雜誌，而由釜山韓華主導發行的華文雜誌，則大概出現在1990年代。¹⁾

縱觀釜山韓華的華文文學創作，從文學類別上看，主要出現了散文、詩歌和小說等體裁；從作者身份上看，既包括先遷釜山韓華，也包括再遷，以及後遷釜山韓華；從作品的發表時間上來看，大約從1960至2010年代；從作品的出處上來看，或在韓國發行、或在台灣出版、或刊登在美國地區發行的韓華華文雜誌上；從作品內容上來看，熔鑄着先遷釜山韓華真實的生存歷史，再遷釜山韓華對曾經移居生活的點滴回憶，以及隨着後遷韓華的流入，先遷釜山韓華與後遷釜山韓華相互間所體會的新經驗等等。釜山韓華華文文學作品數量不是很多，但構成卻很複雜，想要通過一篇學術論文來全面分析釜山韓華華文文學的整個體系，確實不是一件易事。本文試想從這龐雜的體系中提煉出幾個最能代表釜山韓華“心聲”的關鍵詞：“異邦人”、“(釜山的)中國城”、“韓戰”、“後遷釜山韓華”，並分別從這幾個不同角度來探討釜山韓華華文文學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異邦人”，是釜山韓華在移居生活中的一種真實體驗，大概韓國其他地區的韓華也有類似的感受，這個關鍵詞代表了釜山韓華文學與韓國其他地區

1) 就筆者們目前調查的結果來看是這樣，不能排除收集資料不夠完整的可能性，資料收集工作仍在進行中。

的韓華文學之間存在的共性。本文的目的，不僅在於發掘共性，更在於探討“異邦人”體驗所產生的歷史根源。“中國城”，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連接釜山與釜山韓華的紐帶，在理論上是最應該體現釜山韓華特色的“場所”。因此，釜山韓華文學中的“中國城”，“中國城”中的釜山韓華，究竟具有怎樣的“關係性”²⁾，也是值得探究的問題。“韓戰”，對於釜山韓華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在釜山韓華的人口構成上具有轉折點的意義，更在於它賦予了釜山韓華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因為似乎只有在那段歲月裏，移居釜山的韓國華人是在一個沒有歧視、沒有嫉妒、沒有排斥的國度裏，與當地人一起形成了一個共同抗敵、共同克服戰爭災難的命運共同體。如果說在這個命運共同體中，釜山韓華開始思考或者覺悟自身身份認同的“複雜性”，那麼隨着“後遷釜山韓華”的出現，先遷釜山韓華的多重身份認同再次得到確定；而後遷釜山韓華又在以自身的方式經歷着多重認同的形成過程。

2. 釜山韓國華人的歷史與華文創作

1) 釜山韓國華人的歷史

現有的關於釜山韓華歷史的著作或研究，幾乎都是站在釜山歷史發展的分期上，論述釜山韓華的歷史變遷。本文從韓華的角度，敘述釜山韓華的移居歷史，也可以說是他們在釜山地區的生存史。

首先，早期釜山韓華的形成。

如果說韓國華人的移居歷史是跌宕起伏、百年沉浮，那麼釜山韓華的移居歷史更是雲譎波詭，富有戲劇性。其歷史的開端就始於一次紛爭，這次事件被稱為“德興號事件”。據韓國華人秦裕光在其著作《旅韓六十年見聞錄——韓國華僑史話》中所述：

2) 關於“關係性”的論述將在第4章中詳細展開。

一八八二年後生活在日本港都的華僑，受到日本人的策動也有部分人隨日人來了朝鮮，據聞一八八三年由日本神戶移來釜山的華商德興號老板鄭翼之、鄭渭生等是移住釜山華僑之始。……釜山商務分署的開設，傳聞是因一八八三年所謂“德興號事件”而提早。……問題發生在德興號開設的地點(現釜山市中央洞)在日本的租界地內，故日本領事便立刻要求鄭氏兄弟遷出，但鄭氏兄弟卻置之不理。……後陳樹棠先生便親身赴釜山處理，結果德興號仍在原地開設。³⁾

而這一事件的意義不僅在於它預示着釜山韓華移居歷史的開始，還暗示了早期釜山韓華由日本移居釜山的情況並非鮮有見之，很可能是由日本的長崎，橫濱，神戶等地移居而來。由此可見，釜山韓華自移居釜山之始就不免受到日本的影響。

另外，眾所周知韓國華人90%以上屬於山東出身，但是開港時期的釜山韓華卻並非如此。福建商人自1886年開始就曾在釜山經商，他們或常駐釜山，或將釜山作為據點，往來於釜山和福建之間。在1886年釜山港常駐清商與往來清商的名單中，葉守美和薛得久就是在釜山經商的福建商人。由此可以推測這一現象可能與以福建商人為主流的日本長崎華人具有關聯。再考慮到開港初期釜山已成為日本商人集中地區，葉守美和薛得久這兩位福建華商及其家族很可能是由長崎移居釜山的店長或職員。1883年至1885年間，移居釜山的韓華從出身地上來看，山東1人，廣東10人，浙江2人。由此也可以證實日本華商對於釜山的影響明顯大於清國本土華商。⁴⁾

其次，第一代先遷釜山韓華的形成過程。

如表1所示，此後二十年間，移居釜山的韓華雖然人數不多，但始終呈上升趨勢。從這二十年間的釜山韓華移居人口增長速度與人數上來看，移居率較低，而釜山的清國租借地卻面積遼闊，移居釜山的華人無需競爭就可找到滿意的地點經營自己的店鋪。所以即使同為港口城市，與仁川那種真正意義上的專管租借地相比，釜山的租借地更接近於圍繞領事館而形成的華人聚居區。這種現象也比較自然地引發兩種結果：其一，疲於競爭的韓國華人選

3) 參考秦裕光編著，《旅韓六十年見聞錄——韓國華僑史話》(台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12-14頁。

4) 參考이옥련, 《인천 화교 사회의 형성과 전개》(인천: 인천문화재단, 2008), 84-85頁。; 조세현, 《부산화교의 역사》(부산: 산지니, 2013), 35, 52頁。

擇由原移居地再次搬遷至釜山地區，引起釜山韓華人口的增長；其二，有利於形成以清國領館為中心的清館街，並且促進華人學校的設立⁵⁾，1912年釜山華僑小學正式落成。

<表1：移居釜山韓華人口變化表>⁶⁾

年代	1884	1885	1886	1891	1892	1893	1906	1911	1913
人數	15	17	87	138	148	142	144	168	211

釜山韓華學校的設立，顯示出釜山韓華的移居生活在某種程度上趨向穩定。但是，1903年釜山與上海、海參崴之間再次開辟航線，其結果既促進了釜山韓華人口的增加，同時也引起了釜山韓華人口結構上的變化。即：由早期以商人為主逐漸轉型為以季節性勞動者為主的人口結構。⁷⁾這樣就使得釜山韓華的移居生活在顯現穩定趨勢的同時，由於勞動人口的增加而顯出其具有“移動性”的一面。1910年韓國被迫成為日本的殖民地，1913年釜山的清國租借地也隨之被廢除，原來的“清館街”，由此被日本稱為“支那町”，生活在高壓殖民的釜山韓華，從此身份也被降為“三等公民”。此時期釜山韓華人口隨着清日局勢的變化而增減無常。由此至韓戰爆發前夕，釜山的華人流入人口，大部分是出於擺脫貧困或躲避戰爭(中國的國共內戰)的目的，而移居釜山。這些因素都使釜山韓華的“移動性”更趨明顯。

韓國戰爭是釜山韓華人口結構變化的又一個轉折點。國共內戰避難來韓的華人，由於中韓斷交完全無法按照個人意願決定去留，被外界國際局勢剝奪了居住地區的選擇權。緊接着韓國戰爭爆發，自願或被迫留在韓國各地的韓華，再次為了躲避戰爭之難，紛紛逃往釜山。韓戰爆發前的釜山韓華人口為1942年230名-1948年493名-1952年4,182名，從數字上看約有3,600名韓華由韓國各地避難釜山，僅增長數字大概就是釜山原有韓華人口的10倍。隨

5) 參考부산역사문화대전 <http://busan.grandculture.net/?local=busan> ; 한국향토문화전자대전(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http://www.grandculture.net/>.

6) 參考楊昭全·孫玉梅，《朝鮮華僑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125-130頁。

7) 조세현, 《부산화교의 역사》(부산: 산지니, 2013), 61頁。

後中華民國大使館也由大邱移至釜山，至1954年止釜山的韓華人口占居全韓韓華人口首位，共5,032名。直至1956年局勢趨向穩定，韓華重新出現首爾等地的回流現象，1956年的釜山韓華人口為4019名，1957年為3,879名。雖然呈現一定的減少趨勢，但是仍然有一大部分韓華留在釜山，此時的釜山韓華人口位居全韓韓華人口第二位。⁸⁾至此所謂第一代先遷韓國華人的口結構已基本形成。

再次，第二代先遷釜山韓華的成長以及再遷釜山韓華的出現。

同韓國人一樣深受戰爭迫害的韓國華人，剛剛收拾好戰後流離失所的殘局，安撫好惶惶終日的心情，進入1960年代，在韓國政府的各種壓制政策下艱難度過壓抑的“他鄉”生活。第二代韓國華人在這樣的背景下，慢慢成長起來。

再進入1970年代，由於美軍的駐屯而稍有恢復的釜山韓華聚居區(釜山草梁地區)經濟，不久就又隨着國際時局的變化，釜山韓華經濟再次進入蕭條狀態。當時在韓國人眼裏，作為城市關口的釜山火車站前邊，望眼過去盡是貧民窟與紅燈區的狼藉混雜，視此景為城市之辱。⁹⁾此外，原本釜山韓華從事包括貿易業在內的多種行業，其中的餐飲業在當時更是被稱為“清料理”，價格昂貴。但是1945年以後，由於韓國政府的政策，韓國華人的職業選擇範圍明顯縮小，中餐又在逐漸大眾化，韓國人填補了該行業的空缺，致使釜山韓華的經濟每況愈下，最終結果導致大批釜山韓華再遷他地。其中大多是經濟狀況較好或者在韓華學校任教師之職的釜山韓華，舉家再遷台灣或美國等地。而由釜山再遷他地的韓華，就形成了再遷釜山韓華的一群。

最後，第三、第四代先遷釜山韓華的形成與後遷釜山韓華的流入。

1992年在韓國與中國恢復邦交的同時，韓國與中華民國的邦交中斷，駐釜山台灣領事館也被撤除。在此國際局勢變化下，曾經在冷戰體系下深受反共意識形態熏陶的第一、第二代先遷釜山韓華，不禁陷入身份認同的迷惘

8) 以上人口數據參考華僑志編纂委員會，《華僑志——韓國》(台北：海天出版社，1958)，52-61頁。；根據曹世炫(2013)的敘述，當時全韓韓華人口為82,661名，釜山韓華人口僅占全韓韓華人口的0.2%。

9) 조세현, 《부산화교의 역사》(부산: 산지니, 2013), 141頁。

之中。不僅如此，第三、第四代先遷釜山韓華也慢慢長大，隨着時代的交替，生存環境的變化，第三、第四代先遷釜山韓華開始了自己新的生存思考。從先遷釜山韓華的居住地區分布上來看，雖然大多仍然居住在釜山市中區和東區，但已不再像過去那樣以聚居形式出現，而是分散居住在釜山各個地區。

與此同時，韓中恢復邦交後，中國大陸華人開始流入釜山，又形成了與先遷釜山韓華不同的後遷釜山韓華群體。這一群體主要包括移居勞動者、留學生和國際婚姻移居等。1993年8月釜山市與上海市結為姊妹城市，1998年8月“清館街”再次變為“上海街”。不過最近“上海街”這個名稱出現得越來越少，更多的人開始稱它為“中國城”。

2) 釜山韓國華人的華文創作

跌宕沉浮的歷史使釜山韓華無法避免地具有更加強烈的“移動性”，而動蕩不安的生活又使得釜山韓華難於安心進行文學創作。這種“移動性”不免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釜山韓華文學的發展。從釜山韓華歷史變遷上來看，早期的釜山韓華人口數量很少，還難以構成從事文化或文學活動的規模。由於此時期的釜山韓華，有不少人是南方富商出身，具有留下文字記錄的可能性。如果存在，這些文獻資料應該是用文言文寫成。再加上擁有清國政府的支持，早期的釜山韓華對自己的身份地位都有很強的自豪感。進入20世紀初期，釜山華僑小學的創立為日後釜山華人從事文化及文學活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但此時期的釜山韓華大部分屬於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動者，可以推測他們幾乎無暇顧及從事文化或文學活動。¹⁰⁾由於韓戰，出現人口劇增趨勢的釜山韓華，戰後又持續出現人口移動現象，這些移動人口包括選擇回到原居地的韓華，還有再遷台灣美國等地的韓華。隨着第二、三代釜山韓華人數的增加，華僑學校體制使釜山韓華的社會關係由親屬或同鄉關係逐漸向同學關

10) 釜山韓華學校教師或釜山僑社上層人物，可能曾留下一些文字記錄，這些文獻資料有待今後繼續努力發掘。

係轉型，同時使對故土中國的依戀逐漸轉向對在韓生活經驗的重視。此時期的韓國華人已經在韓定居，具有較強的凝聚力，並且接受了較高層次的教育，因此從事文化以及文學活動較之過去活躍，一些釜山韓華開始向在首爾地區發行的韓華雜誌投稿。1990年代之後，韓國華人在構成上出現了新的變化。中國大陸出身的華人大批流入釜山，他們在大陸成長，至少具有中學以上的文化程度，可以推測他們從事華文創作的機會更大。

釜山韓國華人相關的華文文學創作主要包括四個部分¹¹⁾：(一)1960-2010年代，先遷與再遷釜山韓華登載在韓華華文刊物上的文學作品；(二)1990年代，釜山韓華主導創辦的華文雜誌《韓華》月刊；(三)2000年代，再遷釜山韓華郝明義創作的華文散文集《故事》；(四)2010年代，後遷釜山韓華李文創作的華文長篇小說《蒲公英——文麒留韓記》。

韓國華人大多終日為生計奔波，疏於對文學作品的保存和管理，很多寶貴資料都已失存。從筆者們可以收集到的資料上來看，1960-2010年代，零星在韓華華文刊物上登載文學作品的先遷和再遷釜山韓華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洛藍(筆名)、夏侯辰(筆名)、唯一(筆名)、焉晉琦等。洛藍是韓國華人中屈指可數的詩人，夏侯辰讀初中時移居釜山，也是韓國華人之間公認的名筆之一。1960年代是兩位釜山韓華華文文學創作最為活躍的時期，其中夏侯辰連載在韓華華文雜誌《韓華春秋》上的小說《外人部隊》(1965)，尤其值得關注。先遷韓華的再遷，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韓國華人華文文學創作陣營的部分轉移。原本的先遷韓華，又以再遷韓華的身份，在再遷的土地上，敘說着韓國的回憶。再遷釜山韓華唯一(筆名)和焉晉琦，就在移居美國之後，通過在美國發行的韓華華文雜誌這一平台，主要以散文的形式，自由奔放地抒發自己的情懷。特別是在2010年代，身在美國的焉晉琦還撰寫了紀念韓戰60周年的文章。

不同的經濟背景、政治背景、社會文化背景，對於哪怕是文學雜誌的編輯指向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¹²⁾早於《韓華》月刊發行的華文雜誌，主要

11) 筆者們曾多次走訪釜山韓華學校、釜山韓華協會、釜山韓華教會、其他多個組織及相關人士，也曾經遠赴台灣、美國等地尋找資料，目前可以收集到的資料僅此四種，但是收集工作仍在進行中。

以首爾地區為中心，負責雜誌審稿修訂編輯印刷等工作的主幹人員，都集中在首爾地區，唯獨釜山韓華主導的《韓華》月刊例外。《韓華》月刊發行於1990年5月，僅發行至次年2月停刊，前後共發行過9期。《韓華》月刊的總編輯也是發起人，是第二代先遷韓華李溪信(故)，副總編是在韓戰期間由仁川避難到釜山的第二代先遷韓華柳耀廣。發行在移居地的文學雜誌往往會由於背景資金的不穩定，主幹人員的流動性，以及讀者、作者隊伍的頻繁更新，編輯策略和文學傾向、文化選擇都會出現種種異數。但是一個文學群體一定有着自己獨特的文學作為，有着自己特別的文化關係，社會關係和人際關係，有着屬於它自己的故事，它的得意，它的輝煌，它的艱難，它的各種各樣的尷尬與無奈，一個文學群體就是一種有生命的文學生物，一個具有立體性的文學存在。¹³⁾《韓華》月刊也同樣作為一個立體性的文學存在，利用文學作為，進行獨特的心靈創造；在特別的文化、社會和人際關係中表達特殊的文化情感。

2004年，再遷台灣釜山韓華郝明義出版了散文集《故事》。郝明義1956年出生於韓國釜山，曾就讀於釜山華僑小學和釜山華僑中學，之後赴台灣升入台灣大學，1978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商學系，次年開始在台灣進入出版業工作。1996年創立大塊文化出版公司，任大塊文化董事長。他的著作有《故事》(大塊文化出版)、《工作DNA》(大塊文化出版)等，其中與釜山移居生活有關的作品是出版於2004年的散文集《故事》。

2017年，後遷釜山韓華李文出版了華文長篇小說《蒲公英——文麒留韓記》，作者李文曾任東明大學外教之職，現就讀釜慶大學博士。作者從2006年動筆，至2015年修改完成，歷時近10年之久。小說的很大一部分是作者在釜山一家“考試院”¹⁴⁾的一個只有五六平米大小的房間中完成。在正式出版之前曾登過騰訊網讀書頻道原創文學板塊的首頁，也簽過一家規模不算

12) 程國君，《全球化與新移民敘事——《美華文學》與北美新移民文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4頁。

13) 程國君，《全球化與新移民敘事——《美華文學》與北美新移民文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2-3頁。

14) 韓國的“考試院”指的是一種居住設施，在此居住者大部分是需要長時間準備各種考試的應試生。由於考試院價格低廉，應試生以外的人也經常使用。

大的文學網站，最後於2017年1月由人民日報出版社正式出版。15)

3. 釜山韓國華人的華文文學：“異邦人”之歌

移居者在移居地受到當地居民的排斥，可以說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移居韓國釜山地區的華人也不例外。《韓華》雜誌中有一首詩名為〈異邦人的悲哀〉，這首詩在某種意義上，代表着釜山韓華通過《韓華》雜誌所要發泄的一種抱怨情緒：

有東亞美術祭者，不應許“外人”參加作品。
這事也真奇了！本來，藝術和愛情是不分國別，人種的.....
我從來也未有這樣的，心情沉痛過.....
頭腦一片空白，心情也如一卷白紙.....
如行屍走肉般的走着的走着；不知不覺間；走到一大群人前；
他們在做什麼？好像在辯論着一段歷史的往事.....
我沙啞的叫喊着：喂！你們.....
他們好像沒有一個人聽見；也沒有人理睬我；更沒有人瞧向我！
這次，我歇斯底裏的嚎叫着：你們.....你們該知道異邦人的痛苦嗎？
這次，可能他們聽見了。因為，他們，發出奇異的譏笑聲。
我痛恨，我失望！
他們，為什麼把我看成了異邦人？
我狂怒！我發作，拳打腳踢一番。
竟有兩枝小樹枝折斷下來，驚走一大群飛鳥。
.....16)

15) 參考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韓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7)，256頁。

16) 林樹蘭(西洋畫畫家)，〈異邦人的悲哀〉，《韓華》8月號(首爾：韓中文化協會，1991)，38頁。

這首詩的作者林樹蘭是第二代先遷韓華，一位終生獻身藝術的韓華藝術家，也喜歡寫詩。從他的一些詩作中可以體會到，他用沙啞的聲音，想要叫喊的，想要辯駁的是：我出生在韓國，生長在韓國，我熱愛韓國的藝術，更崇拜韓國的藝術家“李仲燮先生，樸壽根畫伯”¹⁷，“本來，藝術和愛情是不分國別、人種的”，為什麼現實生活中的“排斥”，會被帶到這個本應不論國界的藝術世界中來。

韓國人與韓華之間的排斥關係，具有很長的歷史淵源。早期韓國華人在清國政府的庇護下，以“大國國民”的身份快速順利地擴張了在韓國的居住土地，也輕鬆地聚斂了財富。傲慢自居的早期韓國華人，成為韓國人既羨慕又嫉妒的對象。釜山地區也不例外，如前所述的“德興號事件”，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一八八三年由日本神戶移來釜山的華商德興號，就是在一場糾紛中拉開了序幕。問題發生在德興號開設的地點(現釜山市中央洞)在日本的租界地內，當日本領事要求德興號老板鄭氏兄弟遷出時，鄭氏兄弟的態度是置之不理，其原因恐怕就是鄭氏兄弟相信自己身後存在一個強大的後盾——清國政府。最後也確實是清國官員陳樹棠親赴釜山處理此事，結果德興號仍在原地開設。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釜山韓華移居歷史開端，從某種意義上說，恐怕也可以看作是釜山韓華排斥歷史的萌芽。

再遷釜山韓華郝明義，在他的移居生涯中，切身體驗到了釜山人與釜山韓華之間的“排斥”關係，而這種排斥又具有普遍意義，存在於韓國人與韓國華人之間，具有“相互性”的特征。郝明義在散文集《故事》中是這樣描述這種關係的：

中國人居住在韓國，雙方由於千絲萬縷的過去，有着十分微妙的情愫。小時候走在街上，韓國小孩會叫我們“大國奴，滾回你們自己國家！”中國人講起韓國人，則喜歡稱之為“高麗棒子”。“大國奴”在“高麗棒子”的國度裏，可以選擇的行業寥寥無幾。最普遍的，是開一個以賣炸醬面為主的飯館。韓國人愛吃炸醬面，炸醬面相當於中國人的代名詞。¹⁸

17) 林樹蘭(西洋畫畫家)，〈短談〉，《韓華》7月號(首爾：韓中文化協會，1991)，49頁。

18) 郝明義，《故事》(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110頁。

可以說韓國人與韓國華人之間的排斥具有相互性，就是郝明義在這裏提到的“大國奴”與“高麗棒子”的關係。

“大國奴”，從歷史上看，大概經歷了這樣的演變過程：“대국놈¹⁹⁾”→“대놈”→“되놈”→“되놈”。韓國華人在將“대국놈”譯成“大國奴”的過程中，已經注入了在移居社會受到歧視與排斥的不滿情緒。一位先遷釜山韓華就曾談到：“我在認同上沒有出現過混亂。我很清楚。不管我是否願意，韓國人都稱呼我“되놈, 되놈”，那個時候我就明白了，“啊！原來我是되놈。”²⁰⁾至於“高麗棒子”，“棒子”可能是對韓語“망자²¹⁾”的誤傳。被誤傳為“棒子”，也就含有了輕蔑之意。這裏的“大國奴”與“高麗棒子”似乎極為經典地道出了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度裏的韓國人與韓國華人看待對方的態度，即兩種“情緒”間的相互作用，屬於兩個處於競爭關係的群體間出現的相互排斥現象。²²⁾

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上來看，韓半島地區與中國大陸地區時常發生衝突，正處於艱難時期的朝鮮，加之日本帝國主義方面挑撥離間等因素，對外國勢力更加懷有敵對心理。隨着這些具有“大國國民”身份的移居者在人口上的增多，導致韓國人的就業機會受到威脅。並且由於一些韓華富商在經濟上的獨占地位，使韓國人經濟在發展上也受到制約。再加上，這些早期韓華可以自由往返於韓國與故鄉之間，在韓國人看來，他們隨時都有在韓國聚斂財富後就回到故鄉的可能性。因此，韓國人看待韓國華人就帶有了更複雜的情緒，是同時具有羨慕、嫉妒、恐怖、反感、嫌惡等幾種情感的複合體。²³⁾

由釜山韓華主導刊行的《韓華》雜誌，給釜山韓華創造了一個平台，讓

19) “대국놈”的漢語意思是“大國者”，這裏“놈”的漢語意思是“者”，原本不帶有貶義色彩，現在在韓語中帶有輕視之意。

20) 參考第二代先遷釜山韓華譚正熙的採訪記錄，原文是韓語，筆者譯。김태만, 《내 안의 타자, 부산 차이니스 디아스포라》(부산: 부산발전연구원, 2009), 200頁。

21) 韓語“망자”對應的漢語原本是“房子”或“幫子”，指朝鮮王朝時地方官府的聽差或仆人，也指代高麗時中國使臣所住驛館裏的聽差或仆人。

22) 更具體內容可以參考梁楠，《韓國華人華文文學論——多變的身分，多重的認同》(台北：秀威出版社，2020)，104-105頁。

23) 梁楠，《韓國華人華文文學論——多變的身分，多重的認同》(台北：秀威出版社，2020)，106頁。

他們在這裏盡情“發聲”。通過《韓華》，我們便可以了解到，不僅在文化藝術上，在社會、治安、稅收、教育等各個方面，釜山韓華都可以感受到這種排斥的存在。釜山韓華記者一凡(筆名)是釜山韓華公認的秉持正義，為真理爭辯不遺餘力的記者。²⁴他曾在〈輕鬆的聚會沉重的慎思——釜山篇〉一文中，嚴厲批判了當時正在釜山韓華社會隱隱興起的一陣“不正之風”。他的分析很客觀，認為這種“不正之風”在釜山的興起，首先釜山韓華社會自身應該反省：一是釜山韓華社會缺乏正當娛樂活動；二是釜山韓華社會的僑領沒有拿出強硬管制手段。另外，他還認識到這與釜山韓華所處的移居社會背景也有關係，因為釜山的治安人員總是對釜山韓華的不正之風“網開一面”。在一凡看來，前兩者都是輔助條件，唯有第三者是硬辦法。他甚至認為，移居地政府出面管理才是“硬辦法”，期待釜山的警察或刑警能夠嚴格管制釜山韓華社會的不正之風，使之連根拔除。可現實卻非如此，他失望地感慨道：“可悲的是，韓國治安官吏又回到十九世紀？還是他們對我們中國人獨有着優惠呢，抑或說成是拋棄？”²⁵釜山韓華記者一凡，可以說是“土生土長”的釜山韓華，除了赴台留學的幾年時間外，從沒有離開過釜山。釜山對於一凡的意義，恐怕已經不再是移居地，而是他的家鄉，他真心渴望沐浴家鄉的關懷，對於像一凡這樣的釜山韓華來說，“排斥”已經變成了一種“拋棄”。

釜山韓華也同樣感受到了來自移居社會的“嫌惡”情緒。先遷釜山韓華王齋先似乎在使用自嘲的手法，為這種誕生在“嫌惡症”下的韓華形象進行辯解。作者自封為“老油條”，因為在傳統中國文化中“老油條”常常指代油滑，奸巧，固執又飽經世故的人。在作者眼裏這一形象正吻合韓國輿論中的韓華形象。但是作者卻覺得這種看法實在讓油條受屈：

油條的原料，是一種潔白無瑕，人類維持生計所必須的面粉，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少不了它。雖然它在體型上並不甚高大，但卻有潛在發酵的功能。其發揮的程度往往要比本身大出若干倍……凡是熟悉油條出身的人，都知道是在棍棒下

24) 王齋先，〈新的開始〉，《韓華》5月號(首爾：韓中文化協會，1990)，32頁。

25) 一凡，〈輕鬆的聚會沉重的慎思——釜山篇〉，《韓華》7月號(首爾：韓中文化協會，1991)，28頁。

成長，熱辣辣的油鍋中磨練過來的，他被揉，被壓，被打，被煎熬，最後他仍能
以黃金般的色彩，躋身於市場“社會”……有人批評它身空乏力，體粗空虛。但其
身空乏力，是因為他受了過分發酵摧折，而將五臟六腑倒空。至於體粗而空虛，
那正是涵藏着他的寬懷雅量，不然的話，他怎能容納大量的豆漿機甜酸苦辣的熱
諷冷語。²⁶⁾

作者在這裏將韓國華人比作“油條”，不僅為釜山韓華，也為所有韓國華
人“喊屈”。這裏似乎暗含着三層意義：第一，道出“油條”的委屈。“油條”本
身並沒有錯，錯的是不了解它的人對它產生的誤解；就像韓華被誤解一樣。第
二，“油條”象征韓華身上所具有的克服困境的優秀品質。由潔白無瑕的面粉
經過千錘百煉而得成；因為挨得住揉、搓、打、壓，所以能爆發出比自身大
出若干倍的能力；因為挨得住煎熬摧折，所以又擁有大海般的寬雅胸懷。第
三，“油條”本是韓國沒有的食品，是隨着韓華的移住而被帶到韓國的“舶來
品”。在移居地應該用新的認識來看待這種“舶來品”，而不是帶着“傳統中國”
的有色眼鏡。

這裏所說的“傳統中國的有色眼鏡”，其實是在暗示一種現象，即韓國華
人始終生活在韓華，但是他們卻又似乎總是“不存在”，因為韓國的韓國華人
形象，很多時候是被想像和再創造的產物，並非真實。這種說法不無根據，
韓國的新聞媒體就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作用。從19世紀後期韓國的新聞報道上
看，此時期移居韓國的清軍、商人或勞動者常常是韓國媒體觀察的對象，而
在這些媒體言論中，往往會將韓國華人與19世界末的中國一概而論。日常生
活中韓國華人留給韓國人的印象，偶爾會是誠實親切的商人。但是大多有關
韓國華人的描寫都帶有醜化意味。《朝鮮》、《東亞》等報紙上滿是使用
“凶惡的”、“厭惡的”、“可疑的”、“殘忍的”、“陰險的”、“極惡的”等詞彙來形
容中國人，這種形象又支配着韓國人對韓國華人的想像。韓國華人的聚居區
也被稱為“外國人村”，被描畫得非常具有異國風情。韓國各大媒體一致性地
被強調着韓國華人的“外來性”。這種認識延續到隨後的很長時間，韓國華人
自然也就成為了“理所當然”的“異邦人”。²⁷⁾

26) 王齋先，〈油條受屈〉，《韓華》9月號(首爾：韓中文化協會，1991)，34
頁。

在被想像與再創造的過程中，韓國華人與中國人之間被列為等式。釜山韓華亦是如此，成為了“他者”，成為了永遠的“異邦人”。釜山的“中國城”，也被想像成具有異國情調的“外國人村”。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是，作為釜山韓華的聚居區，彙聚釜山韓華之間各種信息交流，對於釜山韓華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中國城”，在現代化進程中，在釜山的城市再建過程裏，是否忽視了作為生存主體之一的釜山韓華的存在，成為一座“想像之城”？

4. 釜山韓國華人華文文學中的“中國城”： “場所性”的缺失

場所是位於一定空間內의 共同體形成社會經濟關係，擁有共同的價值、信念、象征，並維持日常生活的空間基礎。雷夫(E. Relph)認為場所是行為和意圖的中心，是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的有意義的經驗中心，因為場所和具體經驗聯系在一起。當物理環境、人類活動，以及這些要素與時空脈絡相結合，形成辯證性組合時，就會形成場所認同感。²⁷⁾

位於釜山火車站前草梁洞一帶，曾經包括公墓和田地在內，長寬不過300多米的長方形土地，就是釜山韓華在釜山聚集生活的地方，在當時被稱為“清館街”，現在被稱為“中國城”。釜山韓華設立的華僑小學、華僑中學、華僑協會(原華僑商會)，釜山韓華的商店和住宅都集中此地。雖然有些釜山韓華後來搬離此處，到釜山其他地區生活，但這裏仍然是釜山韓華彼此傳達消息，互相溝通交流的中心，也是文化和心理上的核心²⁹⁾，對於釜山韓華具

27) 정은주, <‘이방인’에 대한 시선 — 해방 이후 한국 언론 담론에 재현된 화교>, 《인문과학》 제113집(2018), 110-131頁。

28) 송영민, <문화지원 활용공간의 장소 정체성 강화방안 — 도시형 한옥마을과 전통마을을 중심으로>, 《한국공간디자인학회논문집》 제10권 5호(2015), 105-106頁。

29) 장세훈, <‘부산 속의 아시아’, 부산 초량동 중화가의 사회생태학적 연구>, 《경제와 사회》 제81호(2009), 314頁。

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台灣一再遷釜山韓華郝明義的印象裏，韓國地形多山，釜山更是丘陵起伏。因此覺得這個城市倒很好描述：“一個港口；一條沿着海岸線蜿蜒的大馬路所形成的交通要道；一片倚山臨海，高高低低綿延在山坡上的房子。”郝明義的父母，是一九四九年後離開山東移居到韓國的。韓戰爆發後，他們又從漢城輾轉來到釜山，就定居在現在釜山的中國城所在地界內。因此他對1960-70年代這裏的地理環境、文化氛圍、社會關係都很熟悉：

火車站對面，越過交通動脈的大馬路，進去一點點，左右又分出兩段窄窄的街道，或者，根本就應該說是巷子。的確，這兩條窄得開進一輛車都嫌窄的街道，韓國人都以“胡同”稱之，只不過，兩者內容都大不相同。

右邊這一條，是每個傍着海洋的城市都會有的，讓水手上岸玩耍的酒吧街。白天，街上只有零零星星的幾家雜貨店開着，門口坐着懶洋洋聊天的歐巴桑，或媽媽桑。黃昏之後，霓虹燈就紛紛亮起，性感嬌豔的吧女，買醉的美國海軍和水手，就吆喝着，晃蕩着，把街道熱鬧了起來。在一九六、七十年代，這樣“德克薩斯胡同”在韓國洋溢着各種意義。

和“德克薩斯胡同”相對，左邊這一條，是另一種氣氛。大約從清朝的時候開始，中國人到釜山來的居住和活動，就以這條街為中心展開，所以，早年韓國人稱之為“清官胡同”。不過，我們都管它叫前街。

前街，總長不過兩百來公尺，主要熱鬧的那一段，更不過其中一半。這是一條具體而微的“唐人街”。

不要說釜山市的華僑，散居在韓國南部其他地區的華僑，也是來做做生活上的各種補充，有那麼一點“趕集”的味道。這樣，前街雖然窄，人來人往，加上有時候在開進來一輛猛按喇叭的小貨車，氣氛就挺熱鬧了。

只是多年後再回去，發現窄得街道固然容易顯得熙來攘往，但是行人一少，也特別顯得冷清，尤其，如果在一個灰蒙蒙的冬日裏。³⁰⁾

按照郝明義的這段描寫，我們似乎可以將其整理為：第一，在名稱上，這裏原本是一條非常狹窄的街道，名稱也不叫作“中國城”，當時被韓國人稱為“清館胡同”，釜山韓華卻習慣稱它為“前街”。第二，在歷史上，這條狹窄的街道，卻有其沉浮跌宕的悠長歷史。第三，在性質上，自清國時期開始，中國人在釜山的居住和活動，就以這條街為中心展開，後來不管是釜山韓

30) 郝明義，〈故事〉(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28-36頁。

華，還是散居韓國南部的韓華，都來此地做生活上的各種補充。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裏具有釜山韓華聚集區的概念——一條“具體而微的唐人街”。

所謂華人聚集區，是指像美國的唐人街這樣，由生活在聚集區內的華人自發形成。聚集區的作用是給新來的移居者提供一個安全的棲身之地，提供社會地位的多種地位，最終使移居者融進主流社會。它不是在移居國境內出現的外國村落，而是移居國社會中的特殊現象，代表移居者適應移居地社會的一種特定方式；也並不嚴格地局限於地理位置上，實際上是一個組織上的概念。³¹⁾比如像紐約唐人街的出現，是美國西海岸反華運動和排華法案直接產生的後果。大批中國人在橫渡太平洋後，又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長途跋涉，橫穿美國大陸，聚居於此，形成紐約唐人街。歷時半個世紀，紐約市的華人幾乎全部都住在這裏。³²⁾由於紐約唐人街自身所發揮的機制和作用，它充分體現了作為華人移居“場所”的“場所性”。

但是與紐約的唐人街相比，不管是先遷釜山韓華還是後遷釜山韓華，在他們的華文作品中，對於這個本應與韓華有着密切關係的“中國城”，卻鮮有提及。究其原因，除了釜山韓華自身所具有的“移動性”以外，作為生存主體的釜山韓華的“不存在”，似乎是更重要的原因所在。

從這條街在名稱的變化上，都可以體會到歷史沉浮、時事變遷的厚重感。位於釜山草梁地區的一條街，在釜山開港時期它被劃作“清國租借地”，韓國人為了使其與對面日本人的“倭館”抗衡，故而稱它為“清館街”；當釜山淪為日本殖民地時，它又變成了“支那町”；韓國光復後“支那町”這個名稱也隨之消失，美軍駐紮釜山，它就與“德克薩斯街”一起成為釜山地區的一道“異國風景”；韓中建交後，這條街再次被掛上“上海街”的頭銜。最近，“上海街”這個名稱又再漸漸消逝，替代它的是“中國城”這個新名稱。而在這一系列的名稱變化過程中，真正生存其中的主體—釜山韓華始終被排除在外，因此只能處於被動接受地位。實際上，正如郝明義所說，釜山韓華習慣稱這條街為

31) 參考周敏著，鮑靄斌譯，《唐人街——深具社會經濟潛質的華人社區》(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4-31頁。

32) 周敏著，鮑靄斌譯，《唐人街——深具社會經濟潛質的華人社區》(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23頁。

“前街”。也許只有這條街是“前街”的時候，它才真正具有釜山韓華聚集區的意義，才真正是“具體而微的唐人街”。

位於釜山草梁地區的這條街，它是釜山中國城的所在地。這條街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釜山韓華被動生存歷史的印證，釜山韓華就在這無奈的歷史蒼黃翻覆中染蒼染黃。

如今釜山的“中國城”，在城市重建中具有了它新的面貌：上海們牌樓、霸王別姬銅像、三國演義壁畫……但這些景觀，也許是韓國人想像的中國城應該有的模樣。這種空間的重新創造，卻像法國人類學家馬克·奧吉(Marc Auge)所批判的那樣，避開了證明歷史脈絡的紀念物，具有無視這一歷史脈絡的傾向。那些寫有建立日期的紀念物，風景的現在化，和暗示風景的過去之間，間隔被拉得越來越大。³³⁾奧吉所定義的人類學的場所，與身份認同，關係，歷史相關聯。也就是說，人類所生存的“場所”，具有“關係性”和“歷史性”。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空間的重建，割斷了釜山“中國城”作為“場所”，應該具有的“關係性”和“歷史性”，成為與釜山韓華身份認同毫無相關的，又不存在歷史性的空間。

場所隨着時間的流逝而形成，在形成類似文化的過程中，出現特定的外形。因此，場所蘊藏着共同體的痕跡，是這些文化資源長時間積累的歷史痕跡的現場。³⁴⁾如今釜山的“中國城”，已經在城市的開發與再建中，很難再找到屬於釜山韓華可以共享的記憶、經驗；現在的人們，已經難於在釜山的中國城認知過去韓國華人移居釜山時的各種痕跡，認識某種出身的表征了。

如今，釜山韓華已經散居釜山各個地區，釜山，對於釜山韓華來說，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客觀坐標或一個單純的位置概念。釜山的移居生活，不管時間長短，他們都已經注入了自己的主觀情感，是曾經維持日常生活和社會關係的場所。釜山韓華即使由釜山再遷他地，也仍然會因為一件小事、一個場景、一種氣息、一部電影等等而引發對曾經的釜山移居生活的回憶。就像再

33) 마르크 오제 저, 이상길·이윤영 역, 《비장소 — 초근대성의 인류학 입문》 (과주: 아카넷, 2018), 87頁。

34) 송영민, <문화지원 활용공간의 장소 정체성 강화방안 — 도시형 한옥마을과 전통마을을 중심으로>, 《한국공간디자인학회논문집》 제10권 5호 (2015), 106頁。

遷美國的釜山韓華唯一(筆名)，聽到《國際市場》這部電影上映的消息，就會引起他的濃濃回憶。因為《國際市場》的背景正是釜山富平洞地區的“國際市場”，而作者的家就住在釜山寶水洞，與國際市場大概只有兩三條街的距離。他還記得，再往南兩條街就是釜山著名的電影街，每到有中國電影上映，會有很多釜山韓華到那裏去看。那裏附近也有四五家釜山韓華開的雜貨店，但是買賣的東西都不同，大家都相處的很好。現在在美國沒有見過類似的，這讓作者更加懷念那個年代在釜山所度過的時光。³⁵⁾

這種情感、記憶、經驗還像再遷台灣的釜山韓華郝明義，多年後，參加倫敦書展，走到唐人街的一家華文書店，都會突然感到好像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釜山的光影、氣味與觸覺裏”。³⁶⁾但是多年來，郝明義經常回釜山，可是他很少回到以前的住處，因為太多記憶轟轟然而來。直到一年夏天，他鼓起勇氣來到那裏，卻發現那個埋藏他多層回憶的地方早已不見蹤影。他可以識別的，只有一只電線杆，以及旁邊原來是理發店的老房子。他“沒敢逗留，甚至沒敢放慢一步地走過了”。³⁷⁾

5. 從“韓戰”到“後遷釜山韓華”：多重認同的確定

“韓戰”，對於釜山韓華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符號。釜山韓華對韓戰的記憶，是當時身臨其境的真實現場：“大火燒紅了半邊天，一夜之間整座城市內已燒毀成了廢墟”，“一陣震耳欲聾的嘶嘶聲，飛來的碎彈片打在鐵橋的弓梁上叮咚亂響”，“一座半塌的紅磚牆下面，發現的一具面目猙獰的焦黑屍體……”³⁸⁾更具有韓國華人與韓國人一起，同甘共苦、共同抗敵的命運共同體

35) 唯一，〈國際市場〉，《韓華文藝》，南加州韓華聯誼會網站 <http://www.hanhwa-la.org>(2015.5.31).

36) 郝明義，《故事》(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33頁。

37) 同上，45頁。

38) 焉晉琦，〈韓戰驚魂——韓戰六十周年實記特寫〉，《韓華世界》第3期

的意義。

在同樣飽受戰爭之苦的情況下，釜山韓華仍然彙集一起，為韓國殘廢軍人募得韓幣數千萬元，韓國政府與韓國人民也對釜山韓華善舉，大為感動。³⁹⁾不僅如此，釜山韓華還組建了“中國搜索隊”等戰鬥部隊，一起參與戰鬥。1951年3月Seoul Chinese(SC)部隊在釜山正式成立，主要目的是收集中共軍的情報，參與該部隊的韓國華人約有500多人。其中，約有200多人被派遣至前線部隊參與實戰，在後方活動的華僑約有300多人。參加該部隊犧牲的韓國華人超過100人。⁴⁰⁾還有年僅二十七歲的韓華青年薑惠霖，主動參加韓軍，驍勇善戰，在“水原戰役”中壯烈犧牲，被韓國政府追認為烈士。⁴¹⁾

韓戰期間移居釜山的韓華夏侯辰(筆名)，為了紀念這位韓華勇士，為了記下這段歷史，於1960年代創作了華文小說〈外人部隊〉⁴²⁾。作者似乎在以小說的形式，暗示着一個事實：始終被看作“外人”、“異邦人”的釜山韓華，卻在移居地與移居地的人民共同書寫着歷史，這是釜山韓華，也是所有韓國華人與韓國人共同經驗的歷史，也是共同創造的歷史。釜山韓華對命運共同體的呼訴，同樣也代表他們對身份認同的重新思考，是一種渴望被承認、被接受的呼訴。

如果說創作於1960年代的〈外人部隊〉代表着釜山韓華對身份認同重新思考的開始，那麼刊登在1990年代《韓華》月刊上的遊記作品，則是釜山韓華探索與尋找身份認同問題的延續。

這些遊記作品的創作時間，正值韓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前夕，時隔四十年之久先遷釜山韓華又重新獲得了去往中國大陸的機會。當在釜山出生長大的第二代先遷釜山韓華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時，他們看待事物的態度，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韓華基金會, 2011), 34-35頁。

39) 焉晉琦, 〈韓戰驚魂——韓戰六十周年實記特寫〉, 《韓華世界》第3期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韓華基金會, 2011), 34-35頁。

40) 조세현, 《부산화교의 역사》(부산: 산지니, 2013), 123頁。

41) 高文俊, 〈憶“韓戰六十周年”——韓華、韓華滿天下〉, 《韓華世界》第3期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韓華基金會, 2011), 32頁。

42) 夏侯辰, 〈外人部隊〉, 《韓華春秋》第8期(首爾: 韓華春秋編輯委員會, 1965)。

更接近於一個局外人的審視。當那個只在韓華學校高中課本上見過的“大觀園”、“天壇公園”等等真實的出現在眼前時，他們會感到除了新奇還有隱約的失望，或是別有一番滋味。當中國大陸的司機將先遷釜山韓華看作韓國人時，他們也不會急於辯解，反而採取默認的態度。⁴³⁾這樣的情景，似乎非常有趣。很明顯，中國大陸人並不把這位來自釜山的華人，看作和自己屬於同一群體；而先遷釜山韓華的默認則表示，此時先遷釜山韓華看待自己的方式，與大陸出租車司機看待自己的方式，在不屬於中國大陸人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四十年，是足夠一代人成長的時間，也足以使在釜山出生的一代韓華習慣釜山式的生活，以及釜山人的思維方式。這樣的經歷就使得釜山韓華在踏上中國大陸這片土地的時候，身份變得模糊不清。先遷釜山韓華，正是通過對自身的變化，以及自身與中國大陸人之間存在差異性的認識，構建不同於中國大陸人的，新的身份認同。⁴⁴⁾

通過與中國大陸人的接觸，先遷釜山韓華反而感知到自己與中國大陸人所具有的“異質性”，即使沒有去過中國大陸的先遷釜山韓華，也可以隨着“後遷釜山韓華”的出現，而再次確認自身的異質性。這種“接觸——異質性”⁴⁵⁾感知，使後遷釜山韓華與先遷釜山韓華，相互感知彼此間的顯着差異。

後遷釜山韓華李文的長篇小說中，就有一段關於先遷釜山韓華與後遷釜山韓華的對比描寫……

華僑女孩性格中既有中國女孩的婉約爽朗，又有韓國女孩的溫柔賢淑。她們既是拿着上邊寫着有中國字樣身份證的韓國人，也是出生、成長在韓國的中國人。她們中多數人精通韓雙語，但混血就不一定，中文程度的好壞和韓國人血液比例的多少成反比。華僑相對來說，和中國人更親近一些，雖然因為從小的生活環境不同，華僑的氣質和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不太一樣。

“純中國”女孩，首當其沖就是親切二字，無論你來自中國的哪裏，無論你是什麼民族，只要是在光榮的革命烈士鮮血染紅的旗幟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張口就

43) 參考輝光，〈暴風雨降臨前的北京城〉，《韓華》6月號(首爾：韓中文化協會，1991)，28-31頁。

44) 更具體內容可以參考梁楠，《韓國華人華文文學論——多變的身分，多重的認同》(台北：秀威出版社，2020)，170-171頁。

45) 參考허설화，〈탈근대사회 유연한 정체성에 대한 고찰: 제한 화교를 중심으로〉，《재외한인연구》제50호(2020)，97頁。

會是唐宋元明清、長城、故宮、長江、黃河、清華、北大、李小龍、章子怡、鄭淵潔、韓寒、郭敬明、周傑倫和娃娃頭冰激凌。熟悉得讓你想起紅領巾、中高考、清貧但絲毫不乏浪漫的中國校園裏的中國式戀愛。可現在在韓國，她們要識時務者為俊傑，韓國的帥哥比同胞來的新奇，來的高、富、帥。⁴⁶⁾

這是作者通過十幾年的釜山移居經驗，親眼所見、親身體會到的先遷釜山韓華，與像自己這樣的後遷釜山韓華之間的“異質性”。作者借主人公文麒的眼睛，可以清楚“辨認”三種類型的女生：一是韓國人，二是出生於釜山的華僑[先遷釜山韓華]，三是和他一樣，中國人的血統，又在中國出生、長大的“純中國人”[後遷釜山韓華]。作者所謂的“純”，並非血統上的意義，而帶有文化上的內涵，特別是指伴隨整個成長過程的生活環境影響。這些“在光榮的革命烈士鮮血染紅的旗幟下成長起來的”，“張口就會是唐宋元明清、長城、故宮、長江、黃河、清華、北大、李小龍、章子怡、鄭淵潔、韓寒、郭敬明、周傑倫和娃娃頭冰激凌”，“熟悉紅領巾、中高考、中國式戀愛”的“純中國”女孩所浸染的文化，是在韓國出生成長的先遷釜山韓華未曾接觸，也不甚了解的部分。而“性格中既有中國女孩的婉約爽朗，又有韓國女孩的溫柔賢淑”的先遷釜山韓華女孩，又經歷了怎樣的文化洗禮，卻是作者不得而知的。因此，自然也就無法像敘述“純中國女孩”時那樣，倒背如流般呈現給讀者了。先遷釜山韓華與後遷釜山韓華，各自經歷着不同的文化混種過程。⁴⁷⁾

那麼後遷釜山韓華李文所不知道的，伴隨先遷釜山韓華成長的“文化背景”又是怎樣的呢？通過再遷釜山韓華郝明義的文學，可以了解到釜山韓華不僅沐浴在韓國整體的文化氛圍中，更始終沐浴在釜山獨特的風俗文化裏。這一點非常有趣，就像一位釜山韓華所說：“釜山屬於慶尚道，我們釜山華僑也有釜山的情感傾向，華僑們也常說‘全羅道華僑和慶尚道華僑關係不好’，所以說釜山非常保守。”⁴⁸⁾至少，再遷釜山韓華郝明義的文學中，就體

46)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韓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7)，34-35頁。

47) 更具體內容可以參考梁楠，《韓國華人華文文學論——多變的身分，多重的認同》(台北：秀威出版社，2020)，182-183頁。

48) 參考第二代先遷釜山韓華譚正熙的採訪記錄，原文是韓語，筆者譯。김태만, 《내 안의 타자, 부산 차이니스 디아스포라》(부산: 부산발전연구원, 2009),

現了其中兩方面的影響：第一是釜山人的“朋友義氣”，第二，郝明義將其總結為釜山人的“激越之情”。

郝明義從小患有小兒麻痺，上初一時，母親的去世，使他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他的防護罩消失，正式和外在世界的環境開始接觸。在他心靈最脆弱的時期，是生活裏出現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新元素——朋友，給他灰暗的心靈帶來的無限溫暖和光明。他仍然記得當時周遭的朋友，不論是原來從小學時期就來往的，還是進了中學之後才認識的，沒有任何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過他，更別說任何一點或明或暗的欺負，他們只是很“平常心”地交往起來。此時，他隱隱覺得韓國人對朋友的理解——韓文的“朋友”，是漢字的“親舊”兩個字。而“親舊”之間，最重要的是“義理”，所以“親舊”、“義理”這些字眼，在韓國文化裏占着非常特別的地位——也在影響着韓國華人，特別是釜山和釜山韓華。因為在韓國提到“朋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電影《朋友(친구)》(郭京澤導演，2001)，而裏面的故事就發生在釜山，電影裏幾個主角讀中學的時代，也和郝明義他們相仿，電影裏主角們穿着的黑色校服、活動的市街，也是郝明義他們成長的時空背景。⁴⁹⁾

對郝明義個人來說，他承認在他的青少年時期，除了老師和同學，影響他最深的就是韓國本身，而他受到韓國文化影響最深的部分，便是韓國人身上，特別是釜山[慶尚道地區]那股“激越之情”，因為這種激越之情，正是講究中庸、持重的中國人所容易忽略的部分：

過去，韓國人因為愛穿白色衣裳，有“白衣民族”之稱，但是二〇〇二年世界杯足球賽在韓國舉行的時候，看着那些衣服要穿紅的、飲料也要喝紅的“紅魔”，倒是覺得這些愛吃辣椒泡菜的人，稱之為“紅衣民族”倒可能更可以表現他們的特質：激情——激越之情。

中國人不免覺得韓國人的性格與文化中有一種粗魯、莽撞的成份。不過，講究中庸、持重的中國人所容易忽略的是，少了那股血氣迸發的沖動，也就沒有激越的力量了。

我的青少年時期在韓國成長，血氣方剛的歲月遇上了那個環境，不知不覺中也就受到相當的影響。⁵⁰⁾

198頁。

49) 參考郝明義，《故事》(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93-98頁。

釜山韓華在“原鄉認同”、“國家認同”都變模糊的情況下，不得不開始新的對於認同的思考。特別是在釜山出生，在釜山長大的第二代之後的先遷釜山韓華，從出生開始就浸染在釜山文化、韓國文化的氛圍中，熟知甚至習慣使用韓國的語言。對他們來說，比起原鄉中國大陸、法定國家台灣，與韓國的紐帶關係更為緊密。

最先提出“自我認同性”概念的約翰·洛克(John Locke)將身份認同定義為一成不變的人格。但是看法早已受到以烏爾裏希貝克(Ulrich Beck)或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為代表的脫近代化、省察性近代化論者的批判。他們認為本質上不存在固定不變的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自原初就是多元性的、複合性的存在，個人完全可以具有多重認同。⁵¹⁾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2009)將人類身份認同的複合性，定義為“身份認同的多元性”。個人的身份認同不是與本人意志無關的“被發現”，而是通過不斷的“選擇”來構建。⁵²⁾釜山韓華已經不再局限於國家民族的框圍，而選擇以生存空間為基礎的“第3身份認同”⁵³⁾。對於釜山韓華來說，他們的“第3身份認同”，就像先遷釜山韓華於德豪，在為身份認同問題困惑許久之後，所得出的結論：“我們是韓國華僑，這就是我的身份認同”⁵⁴⁾。

“第3身份認同”的在特征上具有“多重混種性”，就像於德豪所說：“韓華認同韓國也可以，台灣也可以，中國[大陸]也可以，所以根據想法不同，具有多種能力，有多種渠道……”⁵⁵⁾也就是說，不僅是釜山韓華，大多韓國華人

50) 郝明義, 《故事》(台北: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 100-103頁。

51) 參考존 로크 저, 이재환 역, 《인간오성론》(서울: 다락원, 2009), 83-85쪽; 허설화, <탈근대사회 유연한 정체성에 대한 고찰: 재한 화교를 중심으로>, 《재외한인연구》 제50호(2020), 87頁。

52) 아마르티아 센 저, 이상환·김지현 역, 《정체성과 폭력》(서울: 바이북스, 2015), 61-80頁。

53) 허설화, <탈근대사회 유연한 정체성에 대한 고찰: 재한 화교를 중심으로>, 《재외한인연구》 제50호(2020), 99頁。

54) 參考第二代先遷釜山韓華於德豪的採訪記錄, 原文是韓語, 筆者譯。김태만, 《내 안의 타자, 부산 차이니스 디아스포라》(부산: 부산발전연구원, 2009), 169頁。

55) 김태만, 《내 안의 타자, 부산 차이니스 디아스포라》(부산: 부산발전연구원, 2009), 169頁。

的認同既是中國大陸的、台灣的、韓國的，又不完全是中國大陸、台灣的和韓國的，而是以多重混種的身份認同形式存在。這種“混種性”，就像再遷釜山韓華郝明義妹妹的名字“帶利”：郝明義從小患有小兒麻痺，行動不便，父親為妹妹取這個名字，其實是想彌補“腿”的遺憾。因為這個名字韓國話叫起來很像“打利”，“打利”的發音在韓文裏是“腿”的意思，每當他叫“打利”的時候，原來都是在叫他的“腿”。⁵⁶⁾韓國華人的身份認同，又不像拼圖般是三者的拼接，而是像再遷韓華初安民所說的“煮茶的水”⁵⁷⁾：不管如何試圖將其中的“茶”與“水”分開，它們都再也回不到原來的“茶”與“水”的狀態，而是相互糅雜融合在了一起。

6. 結論：釜山韓國華人華文文學的意義

20世紀90年代以前，即冷戰格局解體之前，人們大體上把國家民族視為人類歷史和文明的基本單位，此時的身份認同，不依靠人類個人自覺地認識而形成，而是被國家民族這個無法抗拒的共同體所賦予。這種共同體主義的身份認同，將主體性的人類視為被動存在，具有排他性的特性。但是身份認同是由個人或集體與周邊世界聯系在一起而形成，隨着社會結構的變動，其特性也會發生變化。⁵⁸⁾

釜山韓華華文文學的意義就在於，作為釜山韓華發聲的平台，它帶給我們一種啟示：釜山韓華的身份認同已經具有“多元性”，但是從移居地社會的接受上來看，似乎尚未同步。遺憾的是，移居地當地人對釜山韓華的認識，還是前近代、近代、冷戰等歷史局勢下形成的韓中關係的產物。是將中國人的認識潛藏底層，並在此基礎上與各種現實情況相結合，加入新的或扭曲的

56) 郝明義, 《故事》(台北: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 106頁。

57) 初安民, <心情十六行>, 《愁心先醉》(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62頁。

58) 허설화, <탈근대사회 유연한 정체성에 대한 고찰: 재한 화교를 중심으로>, 《재외한인연구》 제50호(2020), 86-87頁。

內容。59)換句話說，就是拋開釜山韓華的“存在”，僅在“中國人”的認識基礎上，發揮着有關釜山韓華的想像。因此，釜山韓華在移居地，永遠是不能融入當地的“異邦人”。與釜山韓華關係最為密切的“中國城”，釜山韓華始終生活在那裏，卻又似乎從來都沒有真正在那裏“存在”過。隨着釜山的城市再建，它又在漸漸失去作為釜山韓華生存場所的“歷史性”與“關係性”，也就是它本應具有的“場所性”。

境界不是牆壁，而是門檻。我們的理想不能成為沒有邊界的世界，而應該成為承認和尊重所有邊界的、可以滲透的世界。尊重所有人的各種差異，共同營造一個平等的世界。60)釜山韓華的身份認同，已經不能再從“被社會承認的認同(國籍)”61)標準來衡量，將他們規範於“中國人”、“韓國人”或“台灣人”。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建立在“個人選擇”基礎上的新型的多重身份認同。如果移居地釜山能夠真正接受釜山韓華的多重認同，承認並保存釜山韓華與釜山當地人共同經歷和創造的歷史，也許釜山的“中國城”將會洗脫“人為(政府主导)”的痕跡，在自然形成的釜山韓華與釜山當地人的生存共同體關係中，共同打造一個與世界各地的“中國城”都相區別的，釜山的“中國城”。它是釜山韓華的“中國城”，同時也是釜山的“中國城”。

【參考文獻】

- 김혜준, <화인화문문학(華人華文文學) 연구를 위한 시론>, 《중국어문논총》 제50집, 2011.
- 김태만, 《내 안의 타자, 부산 차이나이스 디아스포라》, 부산: 부산발전연구원, 2011.

59) 정은주, <‘이방인’에 대한 시선 — 해방 이후 한국 언론 담론에 재현된 화교>, 《인문과학》 제113집(2018), 108頁.

60) 마르크 오제 저, 이상길·이윤영 역, 《비장소 — 초근대성의 인류학 입문》(파주: 아카넷, 2018), 160頁.

61) 허설화, <탈근대사회 유연한 정체성에 대한 고찰: 제한 화교를 중심으로>, 《재외한인연구》 제50호(2020), 102頁.

- 구원, 2009.
- 마르크 오제 저, 이상길·이운영 역, 《비장소 — 초근대성의 인류학 입문》, 파주: 아카넷, 2018.
- 박은경, 《한국화교의 종족성》, 서울: 한국연구원, 1986.
- 송영민, <문화지원 활용공간의 장소 정체성 강화방안 — 도시형 한옥마을과 전통마을을 중심으로>, 《한국공간디자인학회논문집》 제10권 5호, 2015.
- 아마르티아 센 저, 이상환·김지현 역, 《정체성과 폭력》, 서울: 바이북스, 2015.
- 왕더웨이 저, 김혜준 역, 《시노폰 담론 중국문학: 현대성의 다양한 목소리》, 서울: 학고방, 2017.
- 이옥련, 《인천 화교 사회의 형성과 전개》, 인천: 인천문화재단, 2008
- 장세훈, <‘부산 속의 아시아’, 부산 초량동 중화가의 사회생태학적 연구>, 《경제와 사회》 제81호, 2009.
- 정은주, <‘이방인’에 대한 시선 — 해방 이후 한국 언론 담론에 재현된 화교>, 《인문과학》 제113집, 2018.
- 조세현(曹世炫), 《부산화교의 역사》, 부산: 산지니, 2013.
- 존 로크 저, 이재한 역, 《인간오성론》, 서울: 다락원, 2009.
- 허설화, <탈근대사회 유연한 정체성에 대한 고찰: 재한 화교를 중심으로>, 《재외한인연구》 제50호, 2020.
- 李文, 《蒲公英——文麒留韓記》, 北京: 人民日報出版社, 2017.
- 梁楠, 《韓國華人華文文學論——多變的身分, 多重的認同》, 台北: 秀威出版社, 2020.
- 梁必承·李正熙, 全敏譯, 《韓國, 沒有中國城的國家》,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0.
- 《韓華春秋》, 首爾: 韓華春秋編輯委員會, 1964.6-1965.12.
- 《韓華》, 首爾: 韓中文化協會, 1990.5-1991.2.
- 《韓華世界》,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韓華基金會, 2009-2011.
- 郝明義, 《故事》, 台北: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

- 金惠俊·梁楠, <韓國華人華文文學初探>, 《中國語文論叢》第55輯, 2011.
- 周敏著, 鮑靄斌譯, 《唐人街——深具社會經濟潛質的華人社區》,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5.
- 秦裕光編著, 《旅韓六十年見聞錄——韓國華僑史話》, 台北: 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 1983.
- 初安民,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 程國君, 《全球化與新移民敘事 ——《美華文學》與北美新移民文學研究》,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8.
- 楊昭全·孫玉梅, 《朝鮮華僑史》, 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1991.
-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華僑志-韓國》, 台北: 海天出版社, 1958.
- 부산역사문화대전 <http://busan.grandculture.net/?local=busan>
- 한국향토문화전자대전(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http://www.grandculture.net/>
- 南加州韓華聯誼會網站 <http://www.hanhwa-la.org>

【Abstract】

The Practice and Significance of Busan Chinese-Korea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Centered on the Identity

LIANG Nan · LEE Bogo · KIM Hyejoon

“Busan Chinese-Korean” refer to Han Chinese who have lived in the Busan area of South Korea for a long time and groups that have been assimilated or culturally integrated by Han Chinese. The literary works written in Chinese language by Busan Chinese-Korean is “Busan Chinese-Korea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migration period, Busan Chinese-Korean can be divided into earlier group, later group, newcomers group, and relocating group (who moved to Busan and then relocated to other countries).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of Busan Chinese-Korean is unique from that of Chinese-Korean in other parts of Korea: First, there is perfect “mobility” among Busan Chinese-Korean. Second, Choryang area where most Busan Chinese-Korean stay is more “diversified” in term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he “mobility” of Busan Chinese-Korean may cause instability in life and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its literature or cultural activities. The environmental “diversity” in the areas where Busan Chinese-Korean mainly migrates may become an obstacle to their assimilation into locals, and ultimately affect their identity.

The significance of Busan Chinese-Korean literature is that, as a platform for Busan Chinese-Korean to speak out, it brings us a lot of inspiration: Busan Chinese-Korean identity is already “diversified”,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ceptance by the immigrant society, it seems that it has not been synchronized. Regrettably, the understanding of Busan Chinese-Korean by the locals is still a product of South Korea-China relations formed under historical situations such as pre-modern, modern, and cold war era. In other words, it is to ignore Busan Chinese-Korean “existence” to imagine Busan Chinese-Korean. Therefore, Busan Chinese-Korean survival experience in the emigrated place made them never be able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area.

With the urban redevelopment of Busan, the “China Town” with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to Busan Chinese-Korean, has gradually lost its “historicality” and “relationship” which is the “sense of place” it should have. Busan Chinese-Korean identity can no longer be measured by the standard of “identity recognized by society (nationality)”, and it can be regulated as “Chinese”, “Korean” or “Taiwanese”. Busan should accept this new type of multiple identities based on “personal choice” to recognize and preserve the history that Busan Chinese-Korean and the local people in Busan have experienced and created together.

Key words: Chinese-Korean, Busan Chinese-Korean,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Busan Chinese-Korea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China Town, Sense of
Place, 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y

投稿日: 12月29日, 审稿期: 12月29日~1月8日, 結果通知: 1月11日